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ISSN 1671-0398,CN 11-4558/G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能动性建构与民营企业扎根县域社会的实践逻辑研究
作者：赵晓峰，李港
收稿日期：2025-05-07
网络首发日期：2025-08-18
引用格式：赵晓峰，李港. 能动性建构与民营企业扎根县域社会的实践逻辑研究[J/OL].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11.4558.G.20250818.1443.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能动性建构与民营企业扎根县域社会的实践逻辑研究

赵晓峰, 李 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要: 深入探讨县域社会中民营企业发展的能动性建构问题。研究发现, 民营企业通过“接续融入”的互动策略体系, 突破了制度的结构性约束, 构建出“平等对话”的新型政商关系, 实现了扎根县域社会的终极目标。在此过程中, 企业的能动性建构体现为对“社会资本”的整合、利用与维系。具体而言, 企业对“有形”关系网络与“无形”声誉信任等社会资本的组合作用与阶段性转化, 最终促成政商互动向“边界明晰的制度化互动”而演变。同时, 以企业个体化行动能力为切入, 以连续性发展为考察, 强调了企业的策略性行动在塑造基层政商关系动态演变中的关键作用, 超越了单一的“国家调适”视角, 为理解西部地区政商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能动性; 政商关系; 县域社会; 互动策略; 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25)06-0000-00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将更多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 使得地方政府在决策和执行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性, 主要体现在政府对辖区产业发展模式的自主甄别权和对企业的扶持权力^[1]。在这一普遍的发展范式中, 企业的命运及前景通常受制于政府的决策与管控, 这就导致了具有差异化产业特征的企业会受“政商关系”的影响, 进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发展局面^[2]。然而, 笔者在Z县的实地调查中发现, 一个“非政策型”企业的发展似乎“违背”了这一常理: 具有污染风险的工业企业竟得到了“生态强县”的鼎力支持, 并实现了扎根县域社会的最终目标。那么, X公司是如何打破“常规”, 超越制度结构性约束, 从而建构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商关系呢?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探讨成为了本文田野调查与学理性分析的关键所在^①。

目前, 已有学者关注到企业家在政商关系建构中的能动性, 进而将研究视野转向企业主体, 从不同类型创业者的发展轨迹、不同企业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如何选择政治战略等方面, 提供了诸多的田野素材与理论进展, 为理解企业存续提供了更加微观、具体的解释^[2,3-5]。这为接续的研

收稿日期: 2025-0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101); 咸阳市软科学项目(L2024-CXNL-RKX-0009)

作者简介: 赵晓峰(1981—),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 港(1997—), 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本文对调研地点、公司、人物均做匿名化处理。

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企业“个体化”选择及行动能力的片面化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建构是一个阶段性过程,其互动策略受营商环境、地缘环境、社会资本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变化性特征,所以,缺乏对“政商互动”阶段企业“连续性作为”与社会基础的考察,对于理解“政商关系”并无裨益。第二,对基层中小企业政商关系研究的关注不足。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我国民营企业市场中占据着更大的空间,关系着民生与社会的稳定发展,缺乏对中小企业扎根基层社会的过程性关注,便会产生“空中阁楼”的研究现象。由此,对“新型政商关系”的理解,需在“企业能动性建构”这一过程性视角上,对县域社会中小企业进行清晰洞察。

基于此,本文打破既有研究的共时性视角,以X公司扎根Z县以来的发展历程及政商关系的阶段性变化为考察,发现X公司与Z县政府的关系在2014—2024年这十年时间里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平等对话”的根本性转变。究其原因,民营企业通过主观能动性建构,调适出了一套“接续融入”的互动策略体系,先后获得了“社会”与“政府”两大主体的接纳,完成了扎根县域社会的目标。而以往研究中,企业家在政商互动中的关键作用被时常忽略或简单描述,实际上,不论是制度化政商关系亦或“人格化”色彩偏重的“庇护关系”,均是企业、地方社会、政府相互形塑与博弈的最终呈现^[2,6]。因此,不可仅从“国家调适”的角度来探析政商关系的当代转变,而应从企业能动性建构这一过程视角出发,以政商关系的动态演变为依据,研究二者之间的构建机制。

二、企业能动性建构与政商关系重塑

当前,政商关系的研究范式已逐渐从宏观的结构分析转入到微观的社会基础领域,这为理解“中国式”政商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7-8]。但若一味强调国家政权建设或地方科层体制的精神革新,便会忽视企业主体能动性在突破结构限制或“制度”化转向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营商环境的改善过程中,企业不断强化的互动策略与国家的政策调适是相辅相成的,换言之,若企业并未在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应有的能动性,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亦无法形成。

(一) 庇护主义的“消解”与“制度”化关系的维系

一直以来,以“庇护主义”为主导的政商关系类型是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9-12]。既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建立在政府的重要角色、私人关系确立、政治身份的获取等多个方面^[13-15]。诚然,这种关系在一定时期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但长久的“庇护”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也影响了“亲”“清”型政商关系的建构^[16]。因而,庇护关系并不利于企业甚至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所以,对企业而言,消解或“重构”庇护关系以实现“制度化”互动就成为了能动性建构的必然方向,而这一过程则体现为企业家从“知道—做到—改变”的一种接续式抗争变化。

首先,认识庇护。在中西部地区,“扶强不扶弱”的原则是大多基层政府扶持企业的行动策略,部分规模较小、基础薄弱的民营企业便无法进入政府的视野,无法寻求合理的“庇护”。这说明地方政府在产业选择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7]。但这一常态化互动范式的形成,不仅让企业家意识到贴近政府的必要性,也为其发挥能动性提供了必要的空间载体——与政府“拉近关系”。其次,制造“庇护”。在县域社会,基层政府领导“晋升”“出成绩”等目的的实现往往需要企业为其提供支持,而大多数企业的发展又需仰仗政府的扶持^[18-20]。由此一来,以双向互动为前提的政商关系推动了企业与政府间“私人关系的建立”。而善于揣摩政府意图,基于“政绩贡献”做到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私人关系就成为了企业家能动性建构的具体表现,此种关系的建立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平”的竞争,但基于“私人关系”的成功实践实则已突破了制度的界限,为企业换取了生存与协商的发展空间^[21]。最终,改变“庇护形式”。部分学者的研究指出,企业主若拥有政治身份或关联,能有效帮助民营企业突破制度壁垒,实现经济利益的增长^[13,22]。这一现象的源头可追溯至清朝,其中,徽商中的杰出代表胡雪岩购买官职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23]。如今,这类群体被冠以

“红色资本家”的称号,并认为其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享受“有别”于缺失政治关联企业的优待服务。随着国家体制“透明”度的增强,企业家出资购买官职的行为已不复存在,但企业家通过“社会责任”的承担获得“政治帽子”的现象,已逐渐被社会所认可^[24]。这体现在那些对就业、税收及整体经济表现有显著正面效应的行业领军企业,往往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政策扶持与优待。这些企业不仅享受政策上的倾斜,还拥有了更多与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化协商的空间与机会^[25]。因此,相较于依靠“私人关系”推动企业发展,利用社会资本的方式再次成为了商人群体的稳妥选择。这一行为深刻反映了企业家们在敏感互动中的主动调适能力与“隐性抗争”。即从寻求“政治庇护”到获得“政治认同”的策略性变化^[13]。值得关注的是,“社会”这一变量的介入,让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想方设法”接近政府的路径选择,转而形成了一种利用“社会效应”获取制度支持的理性策略。而这一互动范式的改变,也推动了庇护主义的逐渐消解与制度化关系的逐渐产生。

近年来,在市场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制度化合作已经成为政商关系发展的必然方向。在学界内,学者们也热衷于寻找建立“制度化关系”的社会基础。符平认为政企双方以正当透明的方式互动,共同致力于实现公共目标的模式即为制度化关系^[26]。在此基础上,叶志鹏对苏南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行深描,认为政府对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政商互动中人格化因素的抑制和权力任性的消解是构成制度化政商关系的核心因素^[6]。而后,从企业交易成本的角度出发,孙明指出,制度化政商关系不仅可以快速建立“信任关系”,获取关键资源与政策信息,而且维持成本也远远低于非制度化的私人关系^[27]。最终,罗进辉等人发现,制度化程度越高的地方,企业的创业势能会释放的更加充分。这对于地方政府与企业间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28]。诚然,理想化的政商关系既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保障,也是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关键所在。但在基层政商互动之中,政企合作往往以“清白”合作与“亲密”非正式关系并存的形态出现^[29]。事实上,学界亦有研究发现,企业拥有兼具制度化政商关系和非制度化私人关系的“混合型政商关系”,最有可能开展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创新^[27]。也即是说,企业与政府产生“亲密”关系和“正式”的业务合作并非对立,这一方面是由基层县域“熟人社会”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企业家对“社会基础”的巧妙利用,使这种关系在“无负担”的非功利性交往中得以维系,从而促进了二者向“生活世界”^[30]的转向。如此一来,企业家的能动性就表现为对“类”制度化关系的维系。因此,以企业家的行动策略组合为变量,探究“制度化”关系的形成过程,亦是理解当前县域层面政商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 内外有别:企业能动性建构与边界把握

“能动性”作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一直以来都是描述人类行动的框架概念和理论范畴之一^[31]。这一视角本质上蕴含了工具性或能力性的观念,尤为注重社会组织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决策机制与实际运作状况,即组织是否具备应对复杂环境、实现自我超越的能力。而人的主体意愿和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则是将规则性制度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提升社会生产力并形成社会关系的重要前提^[32]。在我国政商关系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政企关系之所以出现“此起彼伏”的阶段性变化,是因为政府、企业主体都拥有能动性建构的意识及行为。因此,企业通过主动融入社会,从而贴近政府的发展策略既是其有意之举,亦是策略选择。在案例中,企业并未“坐等”政府的帮助或解决他们的争议纠纷,而是根据他们的现实所需和能把握、调动的一切资源,组合、拼凑出了一套可行、能动的“问题—解决”机制,这即为企业能动性的体现^[33]。具体而言,企业能动性主要包括“融入社会”的外部经营能力与“情同家人”的内部感化能力。

一方面,企业家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或更为复杂的关系结构来“合理”获取竞争资本、稀缺资源的“社会能力”组成了企业的外部能动性。这一能力对于缺乏足够社会资本的民营企业显得异常重要^[34]。决定着企业在政府和当地社会面前能否将“一般性信任”建构为“可依赖、可信”,并最终变为“自己人”^[35],进而而在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家将个人或企业的

经济追求“嵌入”于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及地缘结构的深度,决定了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及其社会“合法性”的建构。另一方面,企业“内在”的稳定也是融入社会的必然需求^[36]。这就对企业家对内管理的能力提出了重要考验。有学者指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内部环境的影响是企业面对危机时取得成功的关键^[37]。在县域层面,基于政府的要求与企业融入社会的需求,往往会大量雇佣本地员工,因此,企业家对内的行为与态度不仅关系内部管理的成功与否外,亦会产生隐形的社会传递效应而影响社会甚至政府主体对企业的“认知”^[38-39]。所以,除满足企业市场竞争的产品研发及质量保障外,企业对员工的“情同家人”感化亦是企业“过关难过、过关过”的必要条件。

梳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任何得以持续发展的企业均有着较高的能动性建构能力。因此,要厘清当代我国政商关系建构的类型,亦无法绕开民营企业的能动性问题,而对企业外部经营能力与内部感化能力策略性变化的剖析,亦是理解企业扎根县域社会的核心内涵。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说明

本文选择个案研究法,以过程性视角对X公司扎根县域社会的历程进行分析,特别是聚焦于X公司与Z县政府和社会的互动过程,剖析政商关系在企业能动性建构下的动态演变及其形成逻辑。试图揭示在新时代背景下,企业如何通过能动性建构推动政商关系的转变。

(一) 案例背景

Z县是典型的西部山区县。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Z县在政府引导下积极探索生态强县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Z县工业经济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窘境,因此,亟须通过招商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而后,以X公司为代表的系列工业企业就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得以“扎根”。

X公司成立于2014年。公司占地30亩(约2公顷),累计投资5000余万元,设计生产规模为年产商品混凝土30万立方米。近年来,为Z县多个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优质混凝土,在基础设施建设、税收贡献和就业带动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公司还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累计投资近千万元用于厂区环境污染治理和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此外,X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县域经济发展、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和社会维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研究Z县政商关系,尤其是以X公司这一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为例,对于理解企业能动性建构与县域政商关系的动态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 案例选择与田野调查

本文选取X公司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四点考虑:第一,X公司作为Z县唯一规模较大的商品混凝土生产、销售企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二,X公司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入场到求生、从求生到机遇出现、从机遇出现到稳定发展的多个阶段,且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关系建构中实现了政商关系的动态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第三,行业的特殊性与代表性。商品混凝土从加工生产到使用,一般情况下不得超过2小时,否则就会出现凝固、板结等损坏现象。因此,混凝土销售无法脱离“县域社会”,即销售范围仅局限于县城内及其周边,具有很强的本土化属性。且X公司作为“非政策型”企业,具有高度的关系依赖性,这与其他市场化程度更强的产业形成了鲜明对比,具有较强的产业代表性。第四,本文虽属个案研究,但在公司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涉及了多个正式制度的“消解”与“重构”,这实际成为了西部县域社会中众多“同类”企业的缩影,因此,本文的经验亦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笔者对Z县的实地调研始于2020年,并从2021年开始,将其作为一个长期观察的田野对象。一方面,笔者于2021年9月至2024年10月,对X公司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了解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困境与政府支持措施;另一方面,笔者通过当地政府调研、企业会

议参与等形式,获取了大量关于政商关系互动的政策文本、手册、新闻报道和企业文件,从而保证了案例资料收集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四、X 公司扎根县域社会的发展历程

(一) 仓促入场:“回避”政府与融入社会

2014 年,X 公司负责人通过其在职能部门工作的好友得知:CH 高速 ZH 段即将修建。随之通过关系运作,在与两位好友(合伙人)商议后提前规划项目,通过 Z 县招商引资的方式,从 L 市前往 Z 县进行选址、着手修建搅拌站、购置设备、填充资质并得以顺利入驻。但当企业落地 Z 县,计划介入高速路修建项目时,高速路各标段已基本完成了混凝土自拌站的建设,X 公司只得负责高速公路临时标段的混凝土供给。基于现实情况的特殊性与偶然性,企业在入场初期就面临了与原有规划“大相径庭”的经营状态。最终,企业在高速公路项目基本收尾、各标段依次离场之际,才逐渐拥有了“独家代理”的机会。对此,X 公司负责人表示:“那会确实出乎意料,着急的进来,都没有提前规划、布局好,都是最后托了好多人才有资格给高速集团供料。”^①在此阶段,企业生意逐渐“正常”,并通过“一来二往”的熟人介绍,与当地的部分生意人产生了良好的私交。

从上可知,企业在进驻县域之时,其中心任务是全力配合高速集团各标段,完成高速公路的原料供给。因此,企业并未与政府产生过多交集。究其原因,企业通过“关系”入驻该地,试图刻意的与政府保持距离,以防止各类“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企业在生意不好的情况下,并未过多寻求政府帮助,都是通过自身“跑市场、找朋友”的方式来扩展县域社会关系网络,仅通过“朋友介绍”的方式与当地交通局长相结识。所以,在 2014—2016 年间,企业的“刻意回避”导致政府与企业完全是浮于表面的协议式合作,企业也因与政府关系的“疏远”而并未获得过多机会,维持经营或“不亏钱”成为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融入社会”的能动性策略实质上已经为其建构了坚固的“外部”支持与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 艰难求生:利用社会与“中间人”效用的延伸

2017 年,企业利用前期“私人关系”的建立,获得了高速公路各标段收尾时期的混凝土供应权,这一年,X 公司生意获得持续好转,但并未扭亏为盈。2017 年底,随着 CH 高速的全面竣工与 Z 县政府规化的“生态化”转型,企业再次面临生意萧条的状况。而令企业陷入绝境的,是随之发生的两件事:第一,环保处罚。2018 年,Z 县开始大力宣传、发展林下经济及相关产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逐渐加大,X 公司在 Z 县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背景下,面临了企业落地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环境保护部门的顶格现金处罚。政府责令企业迅速搭建物资料仓,否则将会面临“关门”风险。在此危机下,企业因投资过大、停工停产、外债等原因,无法拿出相应资金进行环保整改,于是“不得不”主动加强与政府的联系。负责人通过前期交往关系的再拓展,寻找“中间人”联系到环保局局长,向环保局局长如实阐述了企业当前面临的困境。环保局局长作为 X 公司的环境监管者,语重心长的告诉 X 公司负责人:“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最好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直接撤资,二是迅速搭建料仓,罚款这边我向上级争取协调,能低尽量低。”^②在获取有利消息后,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搭建了符合环保标准的生产材料堆砌仓,办理了环保评审的各项手续,通过了 Z 县的各类环保检查,获得了继续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生存权”。第二,生存危机。2018 年 4 月前后,企业原本从政府租赁的临时用地期限将至,该县主要负责同志便在此区域重新规划了大型物流园区准备落地,给 X 公司下达了“如期关门令”,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企业的打击无疑是空前绝后的。

① 2023 年 7 月 31 日访谈。

② 2023 年 8 月 7 日访谈。

据X公司负责人形容:“拆迁、土地复垦,后续如何发展,外债如何解决等问题,当时令我非常绝望。但多亏了前期认识的一个朋友,通过人家的关系网,向我引荐了上级领导。最终在上级部门领导的协调下,县委县政府同意保留公司,但要我们尽快完善土地手续,于是我四处借款,最终以每亩20多万的价格买下了这片土地,又通过土地抵押贷款,逐渐稳住了企业的发展阵脚。”^①

X公司在经历了上述事件之后,强化了自身的社会关系,解决了“土地”与“生存”这两件大事。这其中,企业通过中间人效应的不断延伸,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建构出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庇护”关系,缓解了自身的生存压力。这一过程的变化则深刻的体现出企业从“融入社会”到“利用社会网络”的能力进化,而对于社会网络的利用与扩展,也使得企业在县域社会“差序格局”的互动圈子中不断向中心涌入,进而走进政府的视野并获得关注。

(三) 机遇重现:制造社会认同与“身份获得”

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企业生意就有了大幅的转变,据负责人描述:“这年公司员工几乎全年无休,甚至搅拌机都因为长时间工作,一年维修了6、7次。”^②这从侧面反映出X公司在这一年内,开始在当地立足。同时,X公司负责人又通过“圈子”的引荐,找到Z县县长。一来如实反应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二来说明违规自拌混凝土所带来的质量隐患和污染风险。其后,又通过“社会网络”与“本地干部”等多重关系获取县长认可,最终县长立足于Z县工业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和与企业主私人关系的建立两个方面,责令出台了《关于在Z县规范使用商品混凝土的试行通知》。如此,在Z县范围内使用有资质单位生产的商品混凝土成为了政府制定的正式制度。这充分说明了企业通过各类能动策略的叠加,已然超越了制度的结构性约束,获得了制度化的正式“庇护”,这为企业扎根县域社会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而企业在成功扎根县域的过程中,除了各类“关系”与“圈子”的融入外,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亦是企业获得声誉与持久生存的关键。

Z县作为彼时的贫困县,“四好农村路”的全面覆盖成为了该县实现脱贫攻坚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X公司不但高标准完成了份内的混凝土提供项目,还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例如:购买农民的滞销产品、资助贫困家庭,甚至在疫情值守、防洪抗汛等政府人手紧缺的重大灾难面前,主动“上岗”,帮助政府一同服务社会。据住建局干部回忆:“当时县上对X公司能否‘不辱使命’还是有些担心的,但看见最终的建设效果、评估结果和他们后续一些让人感动的表现,我们确实觉得X公司是一家有情怀的企业,包括领导开会时都经常夸他们。”^③企业通过社会责任的承担,不仅助推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市、县两级政府的多次表彰,还通过“声誉”的传播,拿下了更多服务县域基础设施建设的“互利共赢”项目。此外,X公司负责人也因与政府长期合作所体现的“踏实”本性和广泛的社会资本积累,得到了Z县给予的明确“政治身份”——政协委员。最终,X公司深深嵌入了县域社会的发展当中,开启了常态化经营的又一阶段。

透析这一时段中企业的“机遇重现”,不难发现,企业通过社会责任的承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进而拥有了制度化的“政治身份”,由此,企业将单纯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的“非平衡”型政商关系演变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关系”并存下的“新”型关系,并逐渐在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共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四) 扎根县域:边界明晰的制度化互动

近两年来,随着基建大市场的萎缩与县委县政府的人事变动,X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相比之前有所下滑,但其扎根地方的关系网络依旧庞大,维持正常的生产对于现阶段的X公司而言,并不困难。这几年中,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2022年初的市级安全检查,受到了市级领导的批评与严厉

① 2023年8月7日访谈。

② 2023年8月4日访谈。

③ 2023年10月11日访谈。

苛责,但企业整改工作落实迅速、改善彻底,最终还得到了新任领导在常委会中的“独家”表扬,并因此获得了“市级安全生产企业”的荣誉称号。此后,企业在 Z 县非公经济党组织成立后,建立了“党支部+企业”的运行模式,在服务县域基础设施建设之余,承担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但与此同时,X 公司负责人表示:“声誉是一把双刃剑、现在我们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所以我平常能低调就尽量低调,默默回馈社会,做好自己,把出风头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企业,这对大家都好。”^①因此,企业因声誉的扩大,再次选择“远离”政府,在日常的互动中也遵循起“边界明晰”的根本原则,但当企业面临困难与挑战时,政府通常会以“主动问诊”的方式出面解决,为企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这一阶段,企业在外经营能力得到全面稳固的前提下,主动选择了“沉默”式发展与回归企业内部。一方面,企业党组织的包抓领导为该县组织部长,基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企业必然努力提升支部形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作为“亮点政绩”回馈政府。另一方面,企业深知“盛极而衰”的道理,因此,企业在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声望”时,选择对“确定”的内部进行“关心”与维系,既是保障自身稳妥发展的最佳办法,也是“感化”员工,塑造无形社会声望的策略选择。由此一来,企业在融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基于边界明晰的制度化互动,政商关系便呈现出“趋同稳定”的状态。

五、企业能动性建构的形塑机制

X 公司能够实现稳定发展,完成从“政策悖离”到“政策扶持”的阶段性的转变,是其在与社会、政府进行互动、博弈与过程中逐渐塑造而成的。因此,对于企业能动性建构的分析,无法脱离企业阶段性发展历程关系互动,本文尝试归纳、提炼了企业能动性形塑机制的分析框架(详见图 1),最终体现为“获取社会资本—利用社会资本—维系社会资本”这一具体互动策略的阶段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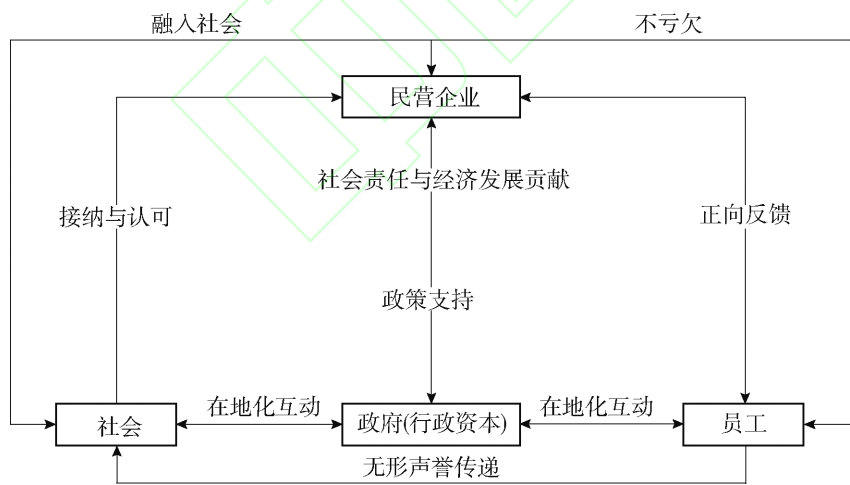


图 1 企业能动性建构的分析框架

(一) 获取社会资本:企业能动性初现

在基层社会,群众对个体事务的关心及对政治事务的“漠视”,导致企业家建构社会关系的难度不断加大。简单的社会行为已无法从本质上获得“熟人社会”的接纳。这就对企业家的能动性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融入社会。而在 X 公司被招入 Z 县的初期,其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便得以体现,脱离制度寻求社会关系以求发展。

① 2024 年 5 月 1 日访谈。

1. 人格信任:在地化关系的建立与融入社会

在县域社会中,较为狭小的地缘环境与亲缘结构成为了社会互动的基础。以家族、亲戚、朋友等人际关系网络为依托的本地资本通常会以“一致对外”的方式来“对付”外来企业,而无法获取情感支持或无法融入县域社会“差序格局”的外来企业往往难逃“消亡”或“被取代”的商业命运。案例中,X公司虽在正式生产之际,出现了有别于预期的发展形势,但其采取与当地企业主、老板频繁进行“礼物流动”“推杯换盏”“利益共享”等方式,将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追求深深融入于地方社会关系网络及地缘结构,实现了私人关系的迅速建立与“互帮互助”模式的形成,这已经初步体现出企业在推动发展中对能动性的建构。对此,X公司负责人认为:“打牌、吃饭、喝茶,或者一两次的‘吃亏’,这些行为看起来好像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有损发展,但实则不然,一来二往的,我和本地商人就成了自己人,他们身边再碰见有那种商混自拌的,都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看看情况。”^①也就是说,X公司负责人在初入Z县之时,就意识到了建构“信任网络”对于日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通过“真诚”的互动,产生了基于“人格化”的初步信任,这一阶段,“先‘维’人、后说事”的交往策略成为了企业家能动性的重要表征。而后,X公司在逐渐转向“自己人”的过程中,成功的利用熟人间“不好意思”的社会心态,在实现了项目资源进一步整合的基础上,还获得了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这实际上为企业后续解决经营问题及政府互动问题提供了足够的社会支撑。

2. 事缘信任:“有形”社会认可的获取

X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商品混凝土销售)事关基础性建设的安危,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产品质量终身责任制。所以,过硬的品质与严格的交付是其打造形象、整合更多项目资源的“看家本领”。据X公司技术负责人表示,“我们这个行业鱼龙混杂,有些人为了节约成本偷工减料,所以既然想干好,就得凭良心,不然我们如果只有关系,没有质量,那大家慢慢也就知道你是徒有虚名,再加上人传人,生意就没法做了。”^②X公司在与本地资本长期合作的过程中,通过严格的质量把控与如期交付逐渐获得了当地市场的认可与接纳,每逢需要混凝土,大家总会第一个想到X公司,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几家不断游离于规则边缘的自拌“零散商”,此类散户缺乏生产资质、工艺落后、施工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但由于利益关系屡禁不止。X公司入资该县并融入熟人社会圈子以后,此类散户逐渐丧失了市场空间,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自行消解。所以,企业基于“有保障”的质量所产生的“事缘信任”,使其获得了“有形”的社会认可。

商品混凝土作为一种无法脱离县域社会的强时效性产品,对于企业负责人的本地“关系网络”提出了重要考验。案例中,企业通过广泛社会互动所建立的“人格信任”与基于“质量保障”所产生的“事缘信任”无疑成为了企业“融入社会”的双重保障。而县域社会信任网络的接纳与认同,最终促成了企业在地化长期生意的往来,由此,X公司在整合社会资本这一方面就形成了天然的优势,且在不断发展的阶段中,呈现出“愈发增强”的特征。

(二) 利用社会资本:企业能动性提升

经验表明,企业家能动性的展现不仅取决于其内在动机,还受限于将发展社会资本的意愿转化为实际成果的能力^[40]。X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当前的发展成就,是因为其在融入社会的基础上,成功的利用了社会关系的扩大效应,获得了行政资本的支持,并领会了政府对企业的“贡献需求”,进而通过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实现了从“寻求庇护”到“获取认可”的动态变迁。仔细来讲,企业利用社会资本提升能动性的策略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再拓展和妥协与回馈两个方面。

1. 社会关系再拓展

“中间人”效用的再扩大是企业获得行政“圈子”关注并逐渐产生关系互动的前提。首先,企业

① 2023年8月2日访谈。

② 2022年11月5日访谈。

通过前期“融入社会”的方式得到了“熟人社会”的接纳,使得“熟悉”这一模糊感觉逐渐变为信任和可靠的外在印象,因此,企业在数次濒临“关门走人”的风险应对中,可以充分依靠自身外部信任网络的拓展,将社会资本的积累转化为获取“行政”资本的入场券。其次,企业对社会关系及其延伸效应的充分利用,不仅获得了同样深谙于县域社会这一结构中的环保局长认可,也取得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最终,X公司在经历了艰难求生阶段中“两件大事”的历练后,其与政府部门“抗争议价”或协商的权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

2. 妥协与回馈

近年来,有学者将地方政府“开门纳客、关门打狗”的行为解释为政府对企业的刁难、勒索与盘剥^[41]。但正如上文所言,政商关系的建构实际是政企双方互动所呈现出的结果。因此,对于政府的一味苛责,实际是对企业家缺失社会责任的一种漠视。在本文案例中,企业通过对政府意图的“成功理解”,建构出了一套“积极性妥协与义务性回馈”的能动策略,不仅扭转了发展的被动,还建构出了一套亲切且和谐的政商关系。其中,企业在处理环保处罚中的应对方式便是很好的说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相当清楚,所以,当时只要领导肯松口,我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会好好整改,就说现在吧,比如我们生产不小心把料洒到公路或者其他地方,不用政府说,我会立刻和员工们一起,想办法处理干净,因为Z县的生态环境好,别说政府了,我更不忍心破坏。”^①

第一,企业负责人将公司的发展嵌入于政府的要求之中,为企业实现由“政策悖离”——“政策扶持”的转换奠定了基础。相较于“对抗”政府,企业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妥协、整改,既是其智慧精神的体现,又在“一查一验”的互动中,增进了彼此间的隐性距离。第二,企业在逐利发展的过程中,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是其义不容辞的使命。X公司负责人表示:“起初可能是想趁着这种机会在领导面前混个面熟,让人觉得咱们不止是想挣钱,但最终做着做着,感觉这变成了自己的一种责任。”^②显然,企业义务性的回馈方式为其带来了正面的社会影响力,提升了企业的政治形象,让企业在“美名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在地性”声誉的不断扩大与“政治身份”的获取^[42]。由此可见,妥协与回馈的策略组合即为县域社会政商关系“升温”的核心原因。

(三) 维系社会资本:企业能动性建构

企业家对于社会资本的维系是获得持续性发展机遇与政商关系趋于稳定的根本保证。第一,企业需要不断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因此,对员工“不亏欠”与“情同家人”,也是企业形象重塑和更新的重要过程。第二,合理把握与政府互动的边界是维系“制度化”政商关系的关键要点。

1. 不亏欠:无形社会声誉的传递

企业的人文关怀是稳定内部结构的关键。一方面,优质企业不仅拥有光环式的外在表征,而且更为注重企业内部融洽氛围的建构,因此,企业主与员工的相处模式成为了企业内部文化建立与动力提升的核心因素。另一方面,X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来自本地,员工的家人或亲属也同样嵌入于企业所建构的外部社会网络之中,所以,“善待员工”亦是企业获得无形社会声誉的一种重要渠道。对此,X公司负责人表示:“我的员工都对我特别好,有时外人都很惊讶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真的把他们当作亲人在对待,不亏待任何人,我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去给他们分工。在工作中,比如他们犯错误,我会严厉的批评和罚款,但我总会以其他方式弥补他们的经济损失,另外,我和员工在厂子一同吃住,并时常陪他们一起下工地、干活、劳动,而且基本不拒绝他们提出的请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用我的实际行动感化员工,所以他们非常认可我。”^③

企业负责人通过柔性的管理与家人般的相处方式,与员工建立了融洽的关系。从这一层面来

① 2024年3月5日访谈。

② 2024年3月5日访谈。

③ 2023年10月9日访谈。

看,企业的外部关系之所以足够稳定,与其企业内员工的奋力工作和“对外宣传”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企业“不亏待”员工的经营策略是获取员工信任 and 良好声誉无形传递的一种必然要求。

2. 不越界:互动边界的把握

杨典指出,政商密切协作但各自行为独立、边界清晰的互动方式即为理想的政商关系^[43]。由此可见,对于“界限”的把握与处理,是政商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本质要求。以广泛存在的“庇护”型关系而言,正是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超越了合理的界限,才导致企业的发展进入“被束缚”或“消亡”的循环当中。案例中,X公司自落地以来,就采取“回避政府”的方式进行社会资本整合,直至陷入发展危机,才利用“中间人”的引荐来获取政府的“暂庇”,且在日后常态化的运营和扩张中,通过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快速消解了这种并不利于长久发展的互动关系,并形成“无事不扰”的互动方式,这样一来,政企双方的往来压力均得以减轻。而“互信、不越界”的原则也就成为了政企互动中的默会知识,并对政商关系的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 扎根县域社会:企业能动性建构的过程性分析

“有困难,找政府”的逻辑人尽皆知,但企业如若一味通过简单的“找关系”来寻求政府支持,不仅会造成“腐败”或“权力寻租”的发生风险,甚至会出现政商关系恶化、企业发展难以为继等意外后果。因此,这就需要企业准确建构出应有的能动性范式,从而在合理揣摩政府意图的前提下获得议价权与协商空间。而X公司从“整合—利用—维系”社会资本的这一过程,实际就是其能动性获得不断强化并最终建构成型的发展过程。

以往研究往往认为企业的能动性是其理所当然的。这就导致企业能动性建构过程及策略变化被时常忽略。本文通过对Z县X公司发展历程的梳理发现,企业在扎根县域社会的阶段中,主观能动性建构是其获得“支持”、政商关系实现变化的客观基础。企业通过阶段化的应对策略组合,完成了从被动经营到常态化主动经营的转变。而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并非总是由于“庇护主义”下“非正式制度”的运用,企业对于“社会资本”的充分利用与细枝末节的把握更是突破“正式制度”结构化约束的关键所在。如今,伴随着我国“清”“亲”型政商关系建构的总体要求,在县域社会中,领导干部往往会“谨慎小心”的处理与企业间的关系,普遍意义上的“非正式关系”虽仍有其存在的沃土,但已几乎处于“搁浅”的状态。因此,企业家的能动性建构并非是“人格化”色彩浓厚的“私人关系”,而是一种契合、嵌套于地方社会及其政策体系的“适应性变化”。

一方面,企业能动性建构体现在“有形”社会资本的整合与利用。在基层地区,政府与社会往往互为所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决定了企业的经营不能仅限于常规业务的开展,还要对地方社会、政府关系等方面进行大量的互动策略投入。首先,X公司在扎根县域社会的过程中,采取“主动嵌入”的方式,凭借“人”与“事”的双重认可,将企业的发展前景嵌入在县域社会的网络结构之中,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实现了外来者向“自己人”的身份转变,并因此获利,完成了对相关竞争企业的超越与排除。其次,企业利用“社会关系”融入政府,通过“社会责任”让政府“信任”,在扩大生产后保持“不越界”理性互动的这套策略体系,使其快速实现了“平等对话”的互动目标,并让政府对其“没得挑”。因此,企业对于“有形”社会资本的利用是能动性建构的重要依托。

另一方面,“无形”社会资本的利用。如果说企业“有形”社会资本是能动性建构的外在特征与立足县域的“敲门砖”,那么,企业的“无形”社会资本就是其立足乡土社会的“看家本领”。如今,基层社会的原子化程度加剧导致企业的社会互动于现阶段的政商或政社关系而言,很可能遭遇“热脸贴了冷屁股”的被动局面,从而无法汲取过多支持。因此,企业生存的核心办法是“苦练内功”,即着重利用“无形”社会资本。第一,企业对于“质量”的苛求关系着地方政府、社会对其的信任建构。第二,企业对员工的“不亏待”既决定着其能否实现“上下一心”,在面对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时保持积极的心态,也是获得“差序”信任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所以,企业若仅依靠外部互

动,则无法在整体层面发挥能动性的全部作用。而企业将“有形”与“无形”社会资本进行结合的这套策略,才是确保企业实现“扎根”,取得发展成效的能动性建构。

六、结论与讨论

在我国政商关系的持续互动中,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发展模式,为研究政商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及学理分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在促进理论脉络向前推进的同时,为地方政府如何与企业沟通、双方如何建立“亲”“清”型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亦是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 X 公司发展历程的梳理,发现了企业能动性建构对政商关系改善的积极作用,产生了有别于学界内一贯认知的“互动描述”。这弥补了已有政商关系研究中的三方面不足:第一,偏重于宏观层面的建构,以静态观察为主,在一个相对片面的时间节点,对其相互关系形成“概念化”的梳理,缺乏对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第二,以政府视角为主导,忽略企业对政府行为的反应与互动策略的调节,实际上,多数取得成功的企业均具备相应的“能动性”策略。第三,脱离“社会”与基层县域经济的运行实际,忽略了社会这一变量对政商关系的冲击与弥合。

当然,必须予以说明的是,本文案例依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单一企业的案例必然存在其特殊性问题。企业根据产业特征、市场化程度等要素的差异性,政商关系本就会出现不同的走向,不受政府重视、支持的企业也未必无法生存。且 Z 县作为西部山区的县城,人口规模小、生态环境优势明显,所以对于有污染风险的工业企业具有天然的“排他性”。但是,相较于对发达地区政商关系的先进经验进行深挖与描述,我们更应将目光投向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县域,思考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及症结所在。这是因为县域层面的民营企业仍是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民生建设与社会繁荣的艰巨使命,所以,我们应当不断探索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机制,此中,政府层面在营造公平竞争的新环境中优化资源分配、激发民企自主发展活力中规范行政权力、筑牢政企互信根基中强化服务保障,并充分尊重、关心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肯定民营企业的主动作为,就成为了提振企业家信心、实现“亲清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 [1] 郁建兴. 中国地方治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 治理研究, 2018(1): 65-74.
- [2] 黄冬娅. 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J]. 社会学研究, 2013(5): 172-196, 245.
- [3] 张建君, 张志学.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J]. 管理世界, 2005(7): 94-105.
- [4] 张建君. 嵌入的自主性: 中国著名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J]. 经济管理, 2012(5): 35-45.
- [5] 朱斌, 吕鹏. 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路径与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4): 138-158, 207.
- [6] 叶志鹏, 李朔严. 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何以形成? ——基于 M 市的历史性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23(5): 67-88, 227-228.
- [7] 张铮, 林智. 科学理解“内生性”: 中国内生性现代化道路研究的概念清源[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8): 233-240.
- [8] 梁平汉, 赵玉兰. 激励相容视角下亲清政商关系的全面构建: 一个集体行动分析框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3(2): 75-87.
- [9] WALDER. A.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101(2): 268-269.
- [10] 符平. 市场体制与产业优势——农业产业化地区差异形成的社会学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8(1): 169-193, 245-246.
- [11] 周黎安. “官场 + 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J]. 社会, 2018(2): 1-45.

- [12] 范晓光,吕鹏.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盖茨比悖论”——地位认同的变迁及其形成[J].社会学研究,2018(6):62-82,243.
- [13] 吕鹏.私营企业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3(4):154-178,245.
- [14] 黄冬娅.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J].社会,2014(4):138-164.
- [15] 耿曙,陈玮.政企关系、双向寻租与中国的外资奇迹[J].社会学研究,2015,30(05):141-163+245.
- [16] 纪莺莺,范晓光.财大气粗?——私营企业规模与行政纠纷解决策略选择[J].社会学研究,2017(3):193-215,246.
- [17] 冯猛.基层政府与地方产业选择——基于四东县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14(2):145-169,244-245.
- [18] 周飞舟.政府行为与中国社会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及范式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2019(3):21-38,204-205.
- [19] WANK, DAVID. L. The institutional process of market clientelism: Guangxi and private business in a South China City[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6, 147(9): 153-158.
- [20] WANK, DAVID. L.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41-251.
- [21] 赵晓峰,任雨薇,杨轩宇.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30-38.
- [22] 孙明,吕鹏.政治吸纳与民营企业家的改革信心:基于中介效应和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4):92-106.
- [23] 高勇强,何晓斌,李路路.民营企业家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J].经济研究,2011(12):111-123.
- [24] 刘金龙.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社会交往模式与特征[J].浙江社会科学,2024(9):76-90,158.
- [25] 纪莺莺.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影响力:制度环境与层级分化[J].南京社会科学,2015(9):65-72.
- [26] 符平,李敏.基层政商关系模式及其演变:一个理论框架[J].广东社会科学,2020(1):194-203.
- [27] 孙明.嵌入与协调:政商关系与民营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J].社会科学,2023(11):148-161.
- [28] 罗进辉,巫奕龙,刘海潮.亲清政商关系的创业赋能效应——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5(4):1131-1151.
- [29] 贺林波,李甜.乡村产业振兴中的政企合作及其社会基础——以湖南省B县黄金茶产业开发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99-115.
- [30]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165.
- [31] 陈学金.“结构”与“能动性”:人类学与社会学中的百年争论[J].贵州社会科学,2013(11):96-101.
- [32] 张树华,王阳亮.制度、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分析[J].管理世界,2022(1):107-118.
- [33] 蔡欣怡.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业主[M].何大明,译.台北:巨流出版社,2013:9-12.
- [34] 折晓叶,陈婴婴.资本怎样运作——对“改制”中资本能动性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4(4):147-160,208-209.
- [35] 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40-54.
- [36] 白雪洁,娜梅雅,艾阳.企业能动性适应与产业链韧性锻造研究——以中国轴承产业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24(6):43-54.
- [37] 代凯.注意力分配:研究政府行为的新视角[J].理论月刊,2017(3):107-112.
- [38] 汪建华.包揽式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与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J].社会学研究,2017(2):

51-75, 243.

[39] 吴理财, 瞿奴春. 反贫困中的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耦合机制[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115-122.

[40] 边燕杰, 丘海雄. 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87-99, 207.

[41] 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J]. 社会, 2014(6): 1-38.

[42] 崔盼盼. 行政干预与优势强化: 项目下乡背景下乡镇政府产业打造行为研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69-82.

[43] 杨典. 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7(2): 30-35, 125.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Role Construction and the Practical Logic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stablishing Roots in County-Level Societies

ZHAO Xiaofeng, LI G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dynamic role construc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ounty-level societi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se enterprises transcend structural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rough a "sequential integration" strategy. This approach fosters a "dialogical parity" in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achieves the ultimate goal of establishing roots into the local society.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terprise dynamic role manifests in the integration, uti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ocial capital. Specifically, the combinatorial application and phased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angible" relational networks and "intangible" reputational trust as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ultimately propel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government interactions toward "boundary-defined institutionalized engagement". Furthermore, adopting the lens of individualized enterprise dynamic role and longitudin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pivotal role of strategic corporate actions in shap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grassroots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This perspective transcends a singular "state-centric governance" viewpoint, offering a nove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business-government dynamics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dynamic role;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county-level society; interaction strategies; social capital

(责任编辑: 刘 凡)